

# 青海民族民間文學資料

(內部參考・請勿引用・注意保存)

## 第3集

——藏族民間史詩“格薩爾王傳”資料專集——

為了讓有關方面更好地了解著名的藏族民間史詩“格薩爾王傳”，我們在搜集、整理這一史詩時，同時搜集編印了這集資料。其中有國內外同志寫的研究文章，有搜集者採訪時的原始記錄，有討論會上的發言，有讀者的來信等。由於時間倉促，來不及一一徵求直接與此資料有關方面的意見，故此資料只作內部參考。

青海省文聯民間文學研究組

青海省文聯印

一九五九年十月

# 目 次

“格萨尔王传”	策·达木丁苏倫	( 1 )
关于史詩“格萨尔王傳”	徐国琼	( 10 )
“格斯爾傳”介紹	白歌乐	( 22 )
从“格萨尔王传”談到史詩的整理	王亚平	( 28 )
討論会記要	青海省文聯民間文学研究組記錄	( 38 )
訪青海省人委古嘉寧副祕書長談話的原始 記錄	徐国琼記	( 47 )
各地來信摘要		
中国民間文藝研究会“民間文学”		
編輯部的來信		( 5 0 )
上海文藝出版社總編室的來信		( 5 0 )
“延河”文学月刊社的來信		( 5 1 )
吉林大学中文系办公室的來信		( 5 1 )
内蒙古語言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室 的來信		( 5 2 )
中共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委書記 卓加(藏族)同志的來信		( 5 2 )

# “格薩尔王傳”

蒙古人民共和国語言學副博士 策·达木丁苏伦

“格薩爾王傳”是藏、蒙族人民極為寶貴的文化遺產。現有藏、蒙文版印的“格薩爾王傳”好多部卷以外，藏、蒙族民間人口頭說唱亦甚為頗多。

“格薩爾王傳”不象“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一向僅僅藏在寺院，成為供奉的經典，而是廣大人民羣衆家喻戶曉的故事傳說。“格薩爾王傳”藏文版雖未版印，但它比任何經典著作都廣泛地流傳在民間。

“格薩爾王傳”蒙文版亦雖然出版前七部，但流傳範圍亦很廣泛。在布利雅特蒙古人民中間，至今還有出色的“格薩爾王傳”說唱家。

內蒙古已經把前七部重新翻印，而后六部也正在付印。對我們研究文化遺產是會起推進作用的，尤其是后六部的初版值得我們歡迎。

“格薩爾王傳”的最初研究者，是青海蒙族學者松巴堪布·依喜巴拉珠爾。十八世紀年代他研究了“格薩爾王傳”之后，曾在自傳里肯定說：“格薩爾王傳”不是佛教經典著作，而是歷史人物傳記。格薩爾本人曾是安木多地方的小國王（汗）。我認為這位老學者的分析考察很正確。其次第四世班禪喬來那木吉勒的師傅，藏族學者洛桑乔其木也在他的著作“佛教的八節和二尚”中提到，格薩爾是第九世紀朗·达尔瑪王以后，十一世紀阿迪沙以前的歷史人物。

西歐，特別是俄國的學者們非常重視和研究過“格薩爾王傳”，俄國學者史密斯（Шмидт）曾在一百年以前出版了“格薩爾王傳”蒙文原本和德文譯本。其后有俄國學者包布羅尼可夫（Боровников），波塔寧（Потанин），列利赫（Рерих），蘇聯學者柯林，其他西歐國家學者弗朗可（Франк），拉弗爾（Лауфер），達維德·尼爾（Давид—Нирл），沙普利和柯泰等人陸續從事研究“格薩爾王傳”並做出了寶貴的貢

但是“格薩爾王傳”的研究工作还是不够深入和全面的。截至目前为止，对于“格薩爾王傳”的性質（特征）还没有進行有系統地分析。格薩爾本人的出生及活動年代以及“格薩爾王傳”蒙文版是否从藏文譯出等等問題还没有得到精确的回答。其原因之一，藏文的“格薩爾王傳”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有系統地研究。

翻閱“格薩爾王傳”蒙文版各部可以看到：

第一部：格薩爾王的出生和少年時代。黃河流域，青海地區有過東薩爾，東薩爾和嶺三個部落。嶺部落的酋長晁同，把一個俘虜的女兒葛薩嫁給本部落的森隆。而森隆不久被流放到北方沙漠荒灘。那時候森隆的妻子生養了格薩爾。格薩爾原系上帝幼兒，為了鎮平弱肉強食，男盜女娼的混亂世界而降生俗世，做為人間之王。格薩爾從小時候就開始消滅挖啄死晁眼睛的餓鷹和愛割小兒舌头的喇嘛的偉大事業。其後格薩爾把沙漠荒灘變為水草肥沃的牧場並以草木變為牲畜，生活富裕起來。晁同看到這些情況，就來大收稅金，當時格薩爾讓他騎上不馴馬放走，晁同勸不着馬，几乎死掉。這樣格薩爾從小時候起，就和貴族高級人們進行鬥爭，並娶美滿的珠牡為妻，驅走晁同，當了嶺部落的王。這一部內可以看到人民羣眾反封建反壓迫的鬥爭和意志。

第二部：格薩爾殺死山一般的黑花虎，表露着男子大丈夫的英雄氣概。他以虎皮做箭套和弓弦。描寫着一個普遍獵民的生活。

第三部：內地中國皇帝，死了皇后以後非常痛悲，他下令全國人民就地舉哀。任何人不能安慰皇帝的心情，當時格薩爾被請，他以很多方法安慰了皇帝，並使人民羣眾免掉办哀難境。這一部很巧妙而很滑稽地描寫着中國貴族統治階級迫使人民舉辦哀事的情境。

第四部：格薩爾王鎮壓了十二頭大魔王，從敵人手里奪回阿爾洛高娃王后。

第五部：以沙賴河戰爭為主。為了防禦從北方襲來的侵略，格薩爾王較長一個時期不在家乡。趁此時機，沙賴河三個王，以大量的兵力侵攻嶺部落，當時晁同不去抵抗，反而投向敵人，使嶺部落淪陷於敵人手里。珠牡高娃后又被敵人霸占，格薩爾的三十英雄亦被害死。格薩爾返回家乡后，首先懲處晁同，並驅走沙賴河三個王，收回婆后珠牡高娃。本

部一方面斥責背叛祖國的晁同，一方面繪出着保衛祖國，保衛人民利益的正义战争。

第六部：有一位魔法师喇嘛，借口給格薩爾頂礼，把他幻变为驥子，并讓做一切繁重的劳动。这时上帝和神佛都沒有給格薩爾救助。只有他智慧齐全的阿洛王后才从魔法师喇嘛手中夺回被变为驥子的格薩爾，以聖水浴沐，現回原身。

第七部：在格薩爾南征北伐之际，他母親不幸与世永別。为了尋找母親的魂灵，格薩爾走遍了天宮和人間都未找到。最后在閻王陰世，才尋見了母親的魂灵被抛在地獄里。当时格薩爾王大怒，打开地獄的铁鎖，殺掉看門的牛头馬面，并捉住閻王，用九十九枝铁棍痛打一陣，閻王變成老鼠逃跑，也未脫掉格薩爾的懲罰。以后格薩爾把母親的魂灵送往天宮投生。这里揭露着剝削階級和喇嘛以閻王、地獄等來恫脅和愚化人民羣衆的真面目。1716年北京出版的七部“格薩爾王傳”以此告終。

本七部據說章嘉呼圖克圖付印出版。但很难以置信。因为第一世章嘉阿旺乔登在“格薩爾王傳”出版前二年（1714年）去世，第二世章嘉曉悲多吉在“格薩爾王傳”出版后一年（1717年）才出生。因此可以推想很可能当时爱好民間口傳文藝的蒙族学者，趁印其他佛教經典而付印的。第二世章嘉到成年后，对“格薩爾王傳”很为不滿，他本人自傳里有此記載。

除了以上七部以外，其續有六部蒙文版“格薩爾王傳”。

第八部：格薩爾王复活在沙賴河战争被殺害的三十个英雄，共同欢乐。

第九部：征服安都乐瑪汗。

第十部：征服阿布坎倉魔王。第九、十部里重点地描寫格薩爾王的英勇事迹，同时竭力企使把晁同当做格薩爾的化身。因此認為這兩部很可能受了軍界人士的影响。

第十一部：較詳細地描寫和黑花虎的作战，并有时还包括着和古瑪魔王的作战景面。

第十二部：和讓索格或拉格其斯汗作战，并娶薩依胡拉为妻。

第十三部：描寫和敖尔洪河流，罕蓋、罕爾、那山嶺的北方那欽汗

作战，这一部里格薩爾王几位后妃們的場面較多。

后几部有时順序排列不一。总之說：后几部卷捲虽然詞句美丽，但沒有很好地寫出维护人民羣众利益的事跡，似乎成了一个英雄好漢的傳記。

还有一部所謂“嶺格薩爾王傳”（蒙文）。这是十九世紀从藏文譯成蒙文的。这部似乎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烏利雅斯泰城一位善通滿、藏語文的民間詩人譯成。因为那附近常常遇到很多有关“嶺格薩爾王傳”的資料。这部傳記虽然共为二十四卷，但事实上只是較詳細描寫沙賴河战争的一部傳記。在傳記最后簽有“格薩爾王傳”由詩人乔巴布寫作，这是引得兴趣的材料。本傳記里有：格薩爾到北方雅尔卡木地方作战，給侄儿南娶給西藏西北部尼瑪國王的親屬為妻；和十一世紀西藏然部落有过和平相处关系等等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資料。

在布利雅特蒙古，民間藝人口傳式的“格薩爾王傳”很多。其中一部分已經記錄起來出版。在布利雅特蒙古流傳的“格薩爾王傳”里除了具有地方文藝性以外，还貫串着薩滿教的形色。布利雅特蒙古“格薩爾王傳”的起头，就和藏、蒙文不同。如其中說：西方五十五天之首天王和东方四十四天之首阿塔·烏蘭为了争夺亲生儿子色根·色布德哥，約定日期進行决斗。但天王到他父王瑪朗之处飲酒过醉，忘記了决斗一事。

阿塔·烏蘭等他三天不見，認為天王不敢前來，就把色根·色布德哥領回。这时尚在搖籃的天王幼儿格薩爾得悉消息，从搖籃中跳出，把阿塔·烏蘭当场摔死。阿塔·烏蘭的死屍懸掛在天地之間，天長日久发爛、发霉，終之变成蒼蠅、蚊子、妖魔等給世間人民帶來了患難。为了鎮压妖魔，拯救民众，格薩爾王降生到貧苦家中。藏、蒙文“格薩爾王傳”里指出格薩爾沒有后代。但在布利雅特蒙古“格薩爾王傳”中提到格薩爾有几个儿子，并为此还專有几部傳記。总的說來，布利雅特蒙古“格薩爾王傳”較为漫長，曖昧，比起蒙、藏文有它独特的風味。

关于藏文“格薩爾王傳”，格薩爾的出生和沙賴河战争兩部基本上相同。其它部門和蒙文版完全不同。如蒙文版中所看到的，格薩爾王到闇王陰世；征服安都乐瑪汗和阿布尔·倉汗；殺死黑花虎以及把格薩爾幻变

为驛子的魔王洛布斯等部門似乎藏文版里沒有。作者尚未見到。

在藏文版“格薩爾王傳”一个部門里較詳細地描寫着格薩爾和北方魔王作战，并把魔王称为英雄·洛格。历史上土耳其一个叫做·洛格部落，曾經在十、十一世紀居住在东部土耳其斯坦，他們常常侵犯西藏，并有一次俘虜西藏的拉喇嘛（即：智光），討索本身大的金子。与此联系起来，格薩爾的北征是否和侵犯西藏的伊斯兰教徒·洛格族作战一事。（或洛格族的阿尔斯朗汗（意为：狮王），曾在十三世紀投降成吉思汗一事記載在元朝秘史。）

列寧格勒圖書館藏有一部藏文版“格薩爾王傳”，此部里把格薩爾王的理想分为四点：

- ①沒有战争灾难，过安宁生活；
- ②沒有貧窮富貴，共同享受幸福；
- ③在嶺部落普及印度文化；
- ④在嶺部落使用漢族法律。

沒有战争灾难；沒有貧窮富貴并和印度及漢族偉大人民建立文化、政治关系的愿望是偉大的，而且也是最正确的理想。正如真金不銹，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是万年不变的。

藏、蒙文“格薩爾王傳”中象珍珠般的貫穿着真理和深意。蒙文“嶺格薩爾王傳”中，当格薩爾北征降魔时給英雄們囑咐：“不要去侵犯别人，但如有人來侵犯你——不要后退。”。这句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嶺格薩爾王傳”中出現的珠牡高娃王后，是一个最典型妇女的形象。她是一个面貌秀丽，心情善良，智慧齐全，意志坚强的女人。蒙文版“嶺格薩爾王傳”不僅是格薩爾王的傳記，同时也是經歷千苦万难的珠牡高娃王后的傳記。总的說來：“格薩爾王傳”是格薩爾保衛祖國小史；珠牡高娃王后遭遇患难小史；懲罰叛徒晁同小史。它以傳記的形式出色的描寫着人民羣众渴望和平幸福的巨著。

—— —— —— ——

傳記的主人公格薩爾王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的后代現居于長江流域西藏东部德格印經院附近。他所奉仰的神佛亦供在古志·关布寺院

里。繼承格薩爾的嶺部落小國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還曾居住在西藏東部。法國女學者達維德·尼爾亦曾訪問過他。關於當地情況，俄國旅行家克資勒夫（Козлов）亦曾詳細的報導過。

阿木多地區拉布朗寺院的一位高級喇嘛敦德布扎拉倉曾是格薩爾嶺部落的人。現在西藏東部其爾呼附近還可以見到收藏格薩爾兵器的房屋，西藏某些寺院里也有收藏着格薩爾的弓、箭、槍、刀等。

西藏東部霍爾甘孜附近居住着霍爾族人。當地人稱為他們就是和格薩爾作過戰的沙賴河三個王的後代。

從以上幾點事實觀察，在西藏東北部或者安木多地區實有格薩爾王其人。為了考證其生活年代，作者從1948年起，在列寧格勒和蘇聯學者們幫助下從事研究，並在這方面得出一點拙見：

首先：第七世紀年代藏王松贊甘布所著“嘛呢噶奔”里就有关於格薩爾王的記載。因此某些學者認為格薩爾是第七世紀或者更早年代的人。但是“嘛呢噶奔”並不是藏王松贊甘布所著，而似乎在十五世紀時期把當時的法律制度及各種傳記史料匯總記載的。因此有關格薩爾的記載也可以包羅進去的。

其次，第八世紀從印度來藏傳教的班瑪鑑乃傳記里關於格薩爾的記也不少。據說班瑪鑑乃的傳記是由他夫人滿達日娃執筆寫就。這樣說來，格薩爾似乎生活在第八世紀的人了。但如果進一步較細致地考證一下，便可以看出，本傳記不是當時的作品，而在很晚時期才寫成的。在傳記里描述着班瑪鑑乃的預言。如預言中說：經過一百年以後，出現朗达尔瑪王，要毀滅宗教。恰巧：經一百年以後，第九世紀西藏出現朗达尔瑪王，毀滅了宗教。班瑪鑑乃又預言說：三百年以後，阿迪沙來到西藏，大興宗教。恰巧：經過三百年以後，十一世紀，印度那朗達拉大學教授阿迪沙來到西藏，大興宗教。班瑪鑑乃又預言說：西藏地方將要出生布頓，波多哇等學者大力興盛宗教事業。恰巧：在十一世紀，布頓，波多哇等大量寫作了宗教經典書籍。其次又預言到，蒙古成吉思汗將要征服中國、西藏等十三個國家；西藏地方要出生散扎巴族的占林王。恰巧：占林王是在十四世紀出生。

奇怪的是，班瑪鑑乃的預言一到十四世紀後突然停止。十四世紀以

后的一些，在班瑪鑑乃的傳記中一點也沒有記載。這是一個大的懷疑。如果說，班瑪鑑乃真正是個偉大的預言家，那麼十四世紀以後事情也應該會提到的。如：十四世紀出生了黃教創造人宗喀巴，其後出生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西藏佛教大為振興；世界大戰等等。再者傳記最末寫道：本書在十四世紀，烏爾金·林巴從高山深谷里拾得。因此依我的看法，本傳記不是在八世紀，班瑪鑑乃所生活年代里所著，而是在十四世紀，把八世紀到十四世紀的一些歷史資料蒐集起來編寫的。烏爾金·林巴並沒有從高山深谷拾得，而很可能他自己編著。同時更可能紅教喇嘛們為了欺騙蒙古汗王和提高自己的名望，假借班瑪鑑乃之名，宣揚十三、十四世紀的一切事件我們很早就預料到等。以這種手腕騙取名声的事情在帕格巴喇嘛傳記中亦有記載。

關於班瑪鑑乃傳記做一總結：它把十四世紀以前的各種歷史資料，如：八世紀的班瑪鑑乃；九世紀的朗达尔瑪；十一世紀的格薩爾王和阿迪沙；十四世紀的占林等蒐集拼湊到一起。正因為這樣其中相互矛盾之處也就不少。如土觀、洛桑吉尼瑪在他“西藏宗教史”一書中所說：雖想書寫有關班瑪鑑乃的傳記，但傳記本身矛盾重重，無法下筆。

從以上幾點可以證明：班瑪夫人和“嘛呢噶奔”一書中所提到有關格薩爾王的記載和作者認為格薩爾是十一世紀年代人物的看法，兩者並不會發生矛盾。

蒙古人民共和國圖書館藏有蒙古古代繪圖史中：承奉天命，格薩爾崩世百年之後，成吉思汗降生人間，征服世界，總攬宇宙。這本史書中所寫成吉思汗出生百年前曾有過格薩爾，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其次我們可以把“格薩爾王傳”和其他有關文獻中所証實格薩爾為歷史人物的資料和中國史書比較看一下。中國史書資治通鑑綱目中寫道：十一世紀阿木多青海地方會有嚙斯囉王，他在1065年，69歲去世。嚙斯囉會擁有大量兵力和英雄。是否可以推想嚙斯囉為格薩爾的變音。又說：嚙斯囉稱王以前，當地國王為嚙斯囉的叔父崔陶圖。是否可以推想為鬼同。藏文“格薩爾王傳”里寫着薩陶屯或者斯來陶屯。（均音譯）再者中國歷史上描寫着嚙斯囉的第三王后是絕色美人。這是否珠牡高娃王后。翻閱中國史書資治通鑑綱目及宋朝史的嚙斯囉的身世和处境，和

“格薩爾王傳”相符之处很多。因此作者認中國史上的魄斯羅王就是格薩爾王。但還須從各方面的史料加以証實的必要。在這方面除了蒐集、出版、研究藏、蒙文“格薩爾王傳”以外，尚待很好地研究阿木多地方古書著作，這樣才可以能够全面解决。

蒙、藏、漢族地區有很多“格薩爾廟”。這裡就會產生這些廟宇和格薩爾王有何連帶關係的問題。關於這點想談几句。西歷三世紀年代，即中國史上三國時代，有一位英雄叫“關云長”，三國志上很壯麗地描繪這個英雄的生平英勇事跡和真誠義氣。關云長的名字在漢族人民中極有聲望。尤其他的真誠義氣成了異姓兄弟結義拜盟的榜樣。當人們結義時在關云長的繪像前面宣誓，象他一樣盡其正義。十六世紀末明朝皇帝王力因深感其義，賜以“帝”號。此後關云長亦稱為“關帝”或者“關老爺”。十七世紀初滿清初代皇帝諾爾哈赤請求明朝皇帝給予奉仰神佛時，明朝就贈送了關帝像。當諾爾哈赤接到關帝佛像後，觀其面容與其父相似，因而即供奉為天（神）。滿清朝室征服中國大陸後，接受漢族文化，信奉關帝不次於孔夫子，就在各地大建廟宇。接着滿清朝廷征服蒙、藏地方後，大派駐屯軍隊，並給駐屯官兵修建關帝廟宇，供奉其弓、刀及侍从人員的塑像。當地蒙、藏人民把關云長將軍當做本民族流傳的愛戴的英雄，稱為“格薩爾王”。事實上沒有任何根據來這樣稱呼的。滿清及漢民族歷史上並未有過格薩爾王，更沒有“格薩爾王傳”等史書傳記。

此外還有“格薩爾頌”。這是喇嘛和宗教人士，利用人民羣衆中頗有聲望英雄的名字，來宣傳佛教的一種手腕。它正如“成吉思汗頌”，“山神土地頌”一樣。還有據說喇嘛們把格薩爾當做扎木色仁（西藏文壽星）化身的說法，實際上這種認識法是錯誤的。松巴堪布曾認為格薩爾並非神佛，而是歷史的真實人物。同時他和章嘉呼圖克圖都會認為“格薩爾王傳”不是佛教經典，它是另一教說的著作。章嘉、繞悲多杰、土觀、洛桑吉尼瑪等，宣稱關帝為扎木色仁的化身，并把關云長三字認成藏文真仁加布（音譯：藏文可能為轉，譯者註）編出關帝或者扎木色仁贊頌。但是他們或其他喇嘛們始終沒有把格薩爾當做过扎木色仁的化身。

十九世紀時代，外蒙扎薩克圖汗盟洛桑桑都布呼圖克圖曾以藏文編著了“关帝頌”兩卷，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圖書館。其中看不到有关格薩爾的言詞。相反地，他在最末寫道：阿木多地方有“格薩爾演義”或者“格薩爾傳記”兩、三本。但智慧无疆章嘉活佛曾在自傳里稱說：它是一种某一詩人以臆編造的，因此本卷內沒有包括進去。

从这些事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喇嘛及宗教人士并沒有把格薩爾当做扎木色仁的化身。

格薩爾王并不是关帝，也不是扎木色仁，他是流傳在人民傳說中的英雄——阿木多地方的國王，历史上的真實人物。“格薩爾王傳”并不是佛教經典，也不是王公高貴人士的贊頌，它是人民英雄故事，寶貴的文化巨著。當我們爱护人民文化遗产和建設新文化的时候，一定要堅持批判、分析、接受的原則。那·米·莫洛托夫曾說過：“人民羣眾文化的真正果实虽然年代隔久，但在社会主义國家里始終是会受到高評的”。蒐集、出版和研究藏、蒙人民寶貴文化遺產——“格薩爾王傳”的艰巨和光荣的任务擺在我們面前。這一重大的任务，在广大学者知識分子和人民羣眾的帮助下，毫无疑问将会勝利地完成的。

（譯自內蒙古蒙古語文研究會編輯“蒙古語文”雜志總第七期1956年第一號，43—52頁。1956年1月呼和浩特市出版）

#### 譯者註

①本論文原名为“格薩爾王傳”，系属作者关于“格薩爾王傳”的一篇論文。

②布利雅特蒙古——蒙古族的一种族，絕大多數居住于苏联布利雅特蒙古自治共和國。我國內蒙呼倫貝爾盟海拉爾市附近亦有少數居民。

③沙賴河戰爭——參照藏文版，即为霍嶺戰爭。霍嶺戰爭发生在黃河流域兩岸，而黃河蒙文叫做沙賴河。

蒙古人民共和國有一部戲劇“沙賴河三英雄”，內容是否就此沙賴河戰爭，不詳知，一九四二年公演。

④高娃——蒙語“美禰”“高尚”。古时代加上高貴妇人本名之后，表示愛戴敬称。如珠牡——珠牡高娃。

現在“高娃”一般也用在女人名上，如：“科尔沁草原的人們”一書中的薩仁高娃。

⑤蒙古族人民通常把关帝庙叫做“格薩爾廟”。蒙古人民共和國及內蒙牧區地帶至今有此習慣叫法。

⑥松巴堪布·依喜巴拉珠爾，又譯為依喜環珠爾，藏文原文為  
མོ་བ་དཔལ་འབྱུང་因讀音不同，音譯不一。

## 关于史詩“格薩爾王傳”

徐国瓊

不朽的藏族民間史詩“格薩爾王傳”，是一部極其珍貴的富有高度人民性和藝術性的民間文學。廣泛流傳于廣大藏族民間。由于大部分采用能唱的詩文敘述格薩爾保衛祖國，保衛人民，抗敵除奸，征魔除怪的史蹟，故又稱為“格薩爾史詩”。藏語一般稱為“甲吾格薩爾納特”，通譯為“格薩爾王傳”。

據初步調查，故事廣泛流傳于青海、西藏、四川、甘肅、雲南等省廣大藏族民間。其次，在蒙古族及青海撒拉族人民中也有流傳。（在撒拉族中流傳時，多流傳于會說藏語的人民中。）流傳在蒙古族民間的，有許多重要情節，如“天嶺卜筮之部”、“英雄誕生之部”、“納妃稱王之部”、“霍嶺大战之部”、“北地降魔之部”等，與藏文本几乎全同；二者許多人名（如格薩爾、珠牡、晁同等）都相同。關於藏、蒙人民中流傳的格薩爾關係問題，向來都沒有確定。蘇聯學者米哈依洛夫認為：“格薩爾故事這個民間文學作品是從西藏流入蒙古的”。

故事在藏、蒙人民中間流傳到現在（也可說是很久以前），已有很程度的不同。內容上已出現許多互不相同的情節，形式上已各具特點。流傳在藏族民間的，以唱的詩文為主，說的散文為次；流傳在蒙古族民間的，以說的散文為主，唱的詩文為次。它在藏、蒙兩族民間，已

成为同源分流，各具民族特色，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民间文学了。

## 一 史詩的特色

这一史詩的特色，从内容上說，首先是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偉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正义一定能战胜丑恶。以“保卫鹽海之部”为例：在嶺國附近有一个拥有十八万户部落的姜國，國王薩丹，仗恃自己國土广大，兵多將勇，竟出兵搶奪嶺國的鹽海，他的保护神鷹鬼神，也一再鼓励他去做这种侵犯別國的罪惡行为。

英雄格薩爾，听到敌人前來侵犯祖國鹽海，沒有任何憂慮畏縮的心情，馬上出兵衛國，并派大臣辛巴梅乳孜，活捉了侵略軍先鋒——王子姜離玉拉托居尔。不管敌人如何兇惡，不管战争如何艰难，英雄的格薩爾，始終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正义的衛國战争，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果然，八年大战，最后勝利終属于嶺國人民。野心的侵略者，終于被消滅了。从古到今，侵略者总是要失败的，听听姜軍将快失敗前夕姜國大臣噶倫貝塔尔唱的几句哀歌吧：

“八年一战連一战，

英雄猛將快死完；

一百八十万众兵馬，

現在殘余无一半。”

这正是侵略者垂死前夕的送葬曲。諸如“霍嶽大战”、“北地降魔”、“平服大食”、“平服祝孤”等各部，最后勝利总是属于为正义而战的嶺國人民。

史詩另一特色，采取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創作方法，通过傳奇式的描述，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热爱祖國，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爭取自由的美好愿望。英雄的格薩爾，不但降服了侵犯別國的薩丹王、霍爾王等类人間的侵略者，惩治了叛國投敌的鬼同。对那些要用“一百个大人作早点，一百个童男作午饭，一百个少女作晚餐”的妖魔鬼怪，也給予应得的惩治。这些妖魔鬼怪，也不过是对現實生活中統治階級的另一种寫照。史詩采取了优美的叙事与抒情相結合，講說与歌唱相結合的形式，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现实斗争生活的重大題材。在

語言运用方面，更加显示了藏族人民擅于詞令的惊人本領。許多唱詞和說詞，采用了大量的諺語、成語、双关語以及一些巧妙的比擬詞匯，大大丰富了史詩的語言藝術。有許多唱詞，則直接采取民歌，說唱起來十分优美，充分显示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和才華，使其內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統一。苏联学者留里科夫在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評述流傳在蒙古族民間的“格薩爾史詩”时說：“格薩爾史詩的特色”，是对人民的信仰，高度的乐观主义，藝術上的鮮明和完整”。

## 二 史詩的来源

从广大藏族人民对格薩爾这一英雄人物的敬仰來看，格薩爾王故事的來源，有一部分可能在格薩爾生存的年代，人們就以集体創作和口头說唱的方式在民間流傳。正因为这样，当格薩爾死后，人們用文字給他記述傳記时，就有可能召集当地的羣众來用民間有关格薩爾的頌詞和傳說丰富其文字記載。关于这一点，在一部蒙文本“嶺格薩爾王傳”的結束語中曾有記載：詩人却布伯仔細地寫下了雄獅大王格薩爾的傳記，傳記寫成后，召集嶺地的人民集会，在会上把傳記唱給人民來听，并要求人民能用幸福的說詞來充实他所記述的不足。同書还載道：当格薩爾臨死时，把國家政务及軍事交付給了自己的親信，同时，把宗教事务交給了却布伯。可知，詩人却布伯是与格薩爾同时，且十分親近格薩爾的人物。当时詩人能召集当地羣众，給羣众演唱自己所記述的“格薩爾王傳”，并希望羣众能用幸福的頌詞來充实他的記述。从这一事來看，很有可能在詩人还没有用文字記述以前，民間就流傳有格薩爾的故事，或至少流傳有能够用來作为充实詩人記述不足的，有关格薩爾的幸福的頌詞了。

史詩“格薩爾王傳”，是隨着流傳时间的发展而依靠集体創作的力量不断发展与丰富起來的。史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从整部史詩的情况來說，实际是民間口头文学与文人書面文学互相結合，互相丰富的過程。即民間口头流傳了格薩爾故事后，文人根据口头流傳的材料，用文字加以記錄、加工、整理或再創作。这样，民間便产生与流傳了各种各样的抄本。民間再根据这些抄本，再用口头与書面流傳的方式加以

流傳。在流傳中又加以丰富，在漫長的年代里，史詩便这样互相影响地发展起來。

由于有各种抄本（有时也有少数木刻本）大量流傳于民間，所以曾有人認為这一史詩是产生于个人的書面文学；从几次到民間搜集这一史詩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已搜集到的資料來看，这种看法是不合乎情况的。現在所能看到的各种抄本，沒有象一般藏族書面文学那样署有作者姓名和創作經過。許多抄本同屬一部，在內容上往往有很大的出入。各种抄本的地方色采也非常濃厚（尤其表現在語言方面）。史詩創作的集体性、匿名性、变異性、傳統性和地方性等等特征，足以証明史詩源于民間文学的可能性。

其次，藏族的書面文学，和漢族的書面文学一样，一般說來是比较定型的。而史詩的各种抄本，同屬一部，在民間流傳时，即有很大的出入，有的抄本已經過文人的整理加工或篡改。有的抄本还完全保持着口头說唱的原來面目。（或說还是原始記錄）。以“賽馬称王之部”为例：从現在所搜集到的四种木子來看，情況就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有一种流傳在四川德格地区的刻本，这种刻本除正文外，还有前言和后記，其中叙述了整理这种流行本的經過。并署有整理者的梵文姓名阿恰熱卒尼霞撒。后記里說：这种木子是整理者“历时很長，極想將各家所述輯為一个較完善的木子”后，根据多种木子綜合整理而成的。整理者在后記里还寫道：“格薩爾王傳”中“賽馬称王之部”故事，过去所流傳的，據說是霍尔地方一个英雄所記述。內容对賽馬并无多大的叙述，雜乱无章，繆誤甚多；故事（說唱）家热害古阿乜所記述的賽馬故事与此相同。此外，尚有流傳自后藏的與此不同的“賽馬故事，我曾見過約有五种之多”。从这一情況看來，可以肯定，其整理本一定是具有較大綜合性的。其他已搜集到的三种手抄本，情況也各不相同，有一种流傳在康定地区的抄本，与上述这种刻本比較起來，又較为原始。从青海同仁和貴德地区搜集到的兩种抄本，二者均还程度不同地保存着民間口头原始記錄的面目。

从上述情況看來，賽馬之部木子，在民間流傳的至少已有十一种之多（其实远不止此）。从这些互有出入的流行本看來，不論刻本或抄

本，不論前人整理本或原始記錄，都還具有不同程度的民間文學特色，都還足以說明其起源于民間文學的事實。

“格薩爾王傳”中其他各部的情況，從已搜集到的資料來看，與“賽馬稱王之部”都大體相仿，在一定程度上都體現着人民集體創作的特徵。其中有的經過文人的加工、整理、改寫或再創作，而這種經過文人手筆的流行本，也決非一人之功，在某種意义上說也還是一種集體。

文人從民間口头上獲得材料，經過加工、整理，再流傳于民間。如此從民間來，到民間去，往返不已的过程，正是“格薩爾王傳”產生和發展的过程。故云：史詩“格薩爾王傳”，來源于民間的集體創作，是民間文學。

### 三 史詩產生的年代

史詩“格薩爾王傳”產生的時代，歷來研究這一史詩的人們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各種說法相差的距離也很遠。歐洲研究這一史詩的學者，有的認為史詩產生于七、八世紀。主張這種說法，他們所依據的根據有二：即“瑪尼噶本”和“班瑪噶塘”兩書中都曾提到格薩爾。“瑪尼噶本”一書，傳為藏王松贊干布所著，松贊干布為七世紀人；“班瑪噶塘”一書為班瑪鑑乃傳記，班瑪鑑乃為八世紀人。故人們即認為格薩爾故事在七、八世紀就已產生。但，上述兩書里所記述的事件和人物，包括七、八世紀到十四世紀。由此可以肯定這兩部書的作者，都不是七、八世紀的人，而是十四世紀或以後的人。因此，說格薩爾史詩產生于七、八世紀的說法是不可靠的。

第四世班禪的經師，歷史學家勞布桑初魯圖木在其著“印度八大法王”一書中載道：“格薩爾王后于郎達瑪（九世紀摧毀西藏佛教有名的人物），先于阿提沙尊者（十一世紀人物，系印度沙賀爾小國王子，深通佛法，曾到西藏阿里、聶塘、拉薩、扎耶巴等地傳教二十年左右，開創了西藏佛教的甘丹派。）”。此說認為格薩爾史詩產生于九至十一世紀。

原西康鄧柯的林蔥土司，自認為是格薩爾的後裔，土司的老相臣說：“格薩爾生在阿提沙之前，蓮花生（八世紀）之後”。（見“邊政公

論”第四卷四、五、六期合刊。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出版)此說認為“格薩爾史詩”產生于八至十一世紀。

林蔭附近竹慶寺李鑑明說：“依藏房推算，格薩爾降生距今九百年”(同上)。此說認為史詩產生于十一世紀。

苏联米哈依洛夫認為史詩產生和完成于十至十一世紀。并在其專著“蒙古現代文學簡史”一書第5至6頁里述及，這一史詩于十七世紀與“比伽爾米日德汗故事集”、童話“魔戶”等同齊從西藏流入蒙古。并認為，大約在十六世紀末叶或十七世紀初叶以后，大約又過了一百年，史詩在蒙古族中從民間口头上用文字記錄了下來，并出版了。

巴·索特納木在其著“蒙古文學發展史”一書里則認為，這一史詩是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的作品。并肯定史詩是根據民間口头文學而完成的。

近代國內研究這一史詩的學者，對史詩的產生和完成時期，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老舍同志認為：“格薩(爾)王史詩，這部名著在元末明初(十四世紀六十年代——引者註。)寫成，根據民間流傳的格薩(爾)王故事，描繪他的英雄事蹟。”(見“關於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1956年2月27日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載1956年3月号“民間文學”。)此說認為史詩寫成于十四世紀六十年代。

解放後曾久在西藏工作，并從事藏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的單超同志認為“史詩”是十一世紀時，羣眾的集體創作。主人公格薩爾是當時理想的英雄人物。是藏族人民經過長時期創造出來的……。(見“西藏民間文學漫談”一文，載1959年5月号“民間文學”。)

白歌樂同志認為：“格薩(斯)爾不是神話人物，而是實有其人的歷史人物，是十世紀末或十一世紀初人。”并認為‘格薩(斯)爾傳’是根據十一世紀在格薩爾王所支配下的安多地區發生的歷史事件寫成。”(見“‘格斯爾傳’介紹”一文，載1958年6月号“草原”。)

四川省文聯供給的油印資料寫道：“這書寫南宋時，蒙古人由草原南侵，林國(嶺國)的格薩爾王在鄧柯、道孚(均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和青海邊境(指果洛玉樹交界一帶)一帶抵抗外敵的故事，也寫到他(格薩爾)和中國(內地)的攜手和交通。……”(此說未言